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中日关系 > 论文

21世纪初日本对华政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08-03-07 点击次数: 2086 作者: 李 俏

摘要:21世纪初小泉成为日本首相以来,因受日本国内战略、形势及美国因素的影响,又加之中国当前的发展现状,从而促使日方对华实行强硬的“右倾”政策,即:政治上对华推行“强硬”政策,经济上改变对华援助合作政策,外交上实行对中国牵制和防范政策。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21世纪初; 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形势低迷以及国际因素影响的时代背景下,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迎合了当时人心思变的时代潮流,以高支持率当选了日本第87届内阁总理大臣,直至2006年9月,历时达五年半之久。这与90年代日本内阁更迭频繁的情形相比十分引人注目,成为自1972年7月田中内阁成立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任政府。21世纪初始,受小泉内阁对华政策的影响,中日关系进入了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对中日关系、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本文旨在研究21世纪初日本对华政策形成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21世纪初日本对华政策形成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受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影响,日本国内出现了首相更迭频繁、经济持续低迷、社会各势力之间利益冲突激化的混乱政治、经济情形。在这种背景下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右派新生代政治家逐步占据了日本政界要职。小泉内阁上台以来,在国内民众的高支持率下,打着“改革无禁区”的旗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为了迎合国内“新民族保守主义”的思潮,改革的幅度很大,主要特征是逐渐放弃了对外关系上所标榜的和平主义。特别是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比以往历届政府都强硬的政策,形成了21世纪初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日本国家战略变化的影响

围绕日本国家的“未来走向”,在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而近年来具有保守倾向的“普通国家”路线日渐占据了上风,“随着2003年5月15日有事法制相关法案以绝对优势在众议院通过,标志着走‘普通国家’之路已成为日本各派政治力量的战略共识,并为21世纪的日本外交和安全战略规定了基本方向”[1]。所谓“普通国家化”表明日本的对外决策方式呈现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内向性和强硬性。“从内涵看,‘普通国家’论谋求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主张在军事上自我约束的日本变成与别国毫无二致的日本”[2]。这决定了日本政府的国家政策不断向“军事大国”继而“政治大国”的方向迈进,在军事体制上寻求突破的动向也日渐明显。同时,还突出表现在日本与邻国发生摩擦时,经常以“国内舆论”为借口,认为其他国家要屈服于日本的国内利益,从而导致外交摩擦难以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可以说,对华强硬政策的形成是日本国家战略转变的表现。

(二)日本国内社会“右倾”形势的影响

日本的国内政治自90年代以来政局不断动荡且日益保守化。日本政坛在1955年形成了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保守和革新相争”为特征的,长达38年的相对稳定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五五年体制”。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自民党由于自身腐败等原因在1993年大选中,被八党联合势力拉下了单独执政的宝座,此后虽重回执政地位,但只能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因而,在90年代中后期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内,日本首相平均一年一换马,表现出政权的动荡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加上1993年以后社会党彻底放弃了“革新”路线,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体保守化”的右倾局面,以小泉为代表的一些在战后出生或成长的新生代政治家遂占据了包括首相职位在内的政界主导地位。小泉内阁是历届内阁中保守化程度最高的,他们具有的所谓“超越战后”的思想意识,形成了日本新民族保守主义的政治势力,表现为要求改变战后“低姿态”外交,结束对中国的“唯唯诺诺”。而日本的国内经济,则由于1991年“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了长达10年的低迷萧条之中,出现了以前罕见的持续不增长甚至负增长。进入21世纪,日本虽然还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但随着亚洲邻国特别是中国的飞快崛起,很多日本人对未来感到异常悲观,社会上的保守主义思想趁势泛滥,民众要求政府改变现状的呼声日益强烈,小泉在这种背景下大举“改革”旗号上台,在经济及安全领域推行对华的强硬政策。

(三)美国的影响

21世纪初的小泉内阁继承了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历届内阁的外交遗产,即将日美同盟关系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而在小泉首相所吹捧的“新世纪维新”改革中,外交调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所追求的是通过巩固美日同盟,在国内改革受到国内、党内的反对势力而使改革步伐艰难时,利用美国的“外压”来推动改革攻坚,并且利用美日同盟加速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步伐[3]。而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和推进其在亚洲的安全战略,也需要日本的支持和参与,所以要求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鼓励日本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性作用。小泉积极响应美国的举动,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更为亲美的姿态,在对华政策上也不断增强牵制和防范的倾向。

(四)中国发展的影响

中国经济进入21世纪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而日本虽然作为经济大国,但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低迷期,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发展壮大给日本带来了强烈的不平衡感,于是国内鼓吹“中国威胁论”,要求对华强硬、对抗的心态增强,这也是小泉内阁制定强硬的“遏制”中国政策的重要原因。

二、21世纪初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与前几届日本内阁相比,21世纪初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既有一定的连续性,又进行了很大的调整。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日本对华战略由冷战结束初期的“软硬兼施”逐渐演变为对华“强硬”。而随着小泉的上台,日本对华政策更加“右倾”,其“强硬”的牵制防范中国的政策主要表现为:

(一)在政治上对华推行“强硬”政策

首先,最突出的表现是小泉在执政五年多的时间内连续六次参拜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日本在亚洲各国进行的野蛮侵略历史缺乏罪责感,对右翼翻案活动缺少抵制意识,严重伤害了中国以及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其“右倾民族主义”思想暴露无疑。小泉欲借此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民众进行再教育,“为政治大国化做社会心理的铺垫”,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反而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强烈反对,也使日本在亚洲与中、韩等国家的关系迅速恶化,陷于孤立的境地。其次,日本加速了修改“和平宪法”的步伐,通过制定“有事七法案”等手段,在军事体制上寻求突破的动向日渐突出,推行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向“军事大国”迈进的政策。此外,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在这段时期不但协助美国加快介入台海局势,摆出“保卫台湾”的战略态势,更在2005年初与美国共同发表了涉台声明,明确提出应对台湾问题是“共同战略目标”,表明其要强力介入“台海争端”。日本政府提升与台湾实质性关系的倾向日趋明显,不但与“台独分子”联系密切,允许他们访日进行“台风外交”,甚至暗中不排除对台“军售”,并且加紧了对台湾的经济渗透等等。这些“强硬”、“右倾”的对华

政策都严重损害了中日两国“致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导致中日政治关系在21世纪初跌入“冰点”。

(二)在经济上改变对华援助和合作政策

21世纪初小泉内阁时期的“中日经贸关系应当说是处于建交三十多年来最为活跃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877.5亿美元,2002年的1019.1亿美元,2003年的1335.8亿美元,一跃为2004年的1678.9亿美元,四年里将近翻了一番。日本虽然在2004年失去了它垄断十一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国的地位,但中国却取代美国成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也出现高潮,累计合同金额559.6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206亿美元,共27730余项,是我国重要的外资和技术引进来源地。截至2004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达688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468亿美元,居国外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二位”[4]。

可以说,中日经贸领域是两国关系中相互依存最为显著的领域。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日本经济界“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为此,日本不断修改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从2001年开始提高了贷款条件,并欲借此影响中国国内的军事、经济等事务。2003年日本政府大幅度削减了对华日元贷款额度,比上年减少了20%以上,并且以后逐年递减,计划在2008年度终止新的日元贷款项目。日本这种对华经济援助政策的改变,损害了两国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给两国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这一时期日本还在“钓鱼岛主权”、“东海天然气田”等问题上对中国实行强硬态度,将中国东海大陆架划入日本,并与中国在俄罗斯石油输送线路等方面展开能源之争,妄图攫取更多的利益,抑制中国力量的增强。

(三)在外交上对华实行牵制和防范政策

冷战后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从联华抗苏逐渐变为软硬兼施。其主要内容为:第一,以实力地位为后盾,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步发展对华关系;第二,在军事上防范和牵制中国。小泉内阁出于地区安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三方面的考虑,认识到中日关系在21世纪的重要性,但又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主宰亚洲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表现为,一方面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在“台湾问题”及能源之争上对中国推行“强硬”政策;另一方面,企图借美国的力量以及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在外交上“遏制”中国,牵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日本对华外交战略首先表现为策划各种同盟,包围孤立中国。近几年来日本全面拉拢了中国的周边邻国企图来抑制中国的发展,如加紧推行“联合制中”,提升日台关系,违背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承诺。在南方,加大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日本的一名外交官表示“日本期待越南能够在日中关系上起到政治军事平衡器的作用”;通过与印度的经济、军事合作,打造“美日印三角”来制衡中国。在北方,把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优先课题;试图通过经济援助来拉拢蒙古,以“应对中国”。同时,日本还妄图通过争夺东盟国家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进而控制东亚,并且最新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大纲》还把援助重点由以前的东亚、东南亚延伸到“包括南亚、中亚的亚洲地区”。其次,在军事上构筑了“防范周边事态体系”,以达到牵制围困中国的目的。2004年,日本自卫队与美、韩等国进行了联合军演,是除美国以外参演兵力最多的国家。而自2000年开始,日本便借不同名义与一些国家在南海和印度洋地区进行军事演习。通过这些演习,为日本熟悉这一地区的环境,针对中国制订“应对方案”做了准备。此外,日本还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事禁令等等,这些行为都损害了中日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三、21世纪初日本对华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两面性的特点,即在政治上采取了通过加强日美同盟遏制中国崛起的强硬政策,而在经济上又意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欲借助中国迅速发展的机遇来恢复发展日本的经济。因此,造成中日关系在21世纪初形成了“政冷经热”的不正常局面,使两国关系产生了一些曲折的变化。

(一)政治上造成“政冷”的僵局

小泉自2001年上台以来,对华推行强硬政策,不顾亚洲人民的强烈抗议,执意连续六次参拜了靖国神社。日

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也趁机兴风作浪,如他们为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历史而编写了误导青少年的教科书,但该事件于2003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众所周知,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最敏感的因素,只要日本领导人仍然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就不可能真正与曾经深受其侵略之害的亚洲邻国实现和解。与此同时,小泉内阁也接连不断地在“台湾”问题以及“入常”问题上做出举动,这些都导致中日政治关系在21世纪初陷入僵局,停滞不前,致使中日元首互访中断了四年多。小泉内阁的强硬态度堵塞了化解危机的正常渠道,两国间不能展开真诚的对话,使得矛盾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破坏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就中日间政治与安全事项所作的原则规定。

“政冷”的局面阻碍了化解危机的正常外交渠道,损害了两国的互信与合作。小泉推行的是一条追随美国,“协美制华”的外交路线。因此借助美日同盟对亚洲特别是中国一味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制造了一系列的中日纠纷、摩擦事件,使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信赖感在21世纪初大大降低了。在中日关系敏感的历史问题上,受小泉参拜的影响,日本政界也掀起一股肯定甲级战犯的右倾潮流,恶化了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而在安全问题上,日本也加大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力度。不仅由首相、阁僚亲自出面,劝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在《防卫计划大纲》、《防卫白皮书》以及阁僚发言中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另外,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主权”以及“春晓油田”等问题上肆意挑衅,损害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事件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围绕历史是非的争论必然会引发感情冲突,而感情冲突又给两国政治与安全合作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也导致了日方对民间的诸如2004年亚洲杯赛期间的“球迷事件”等大肆渲染,造成了恶性循环,使得两国不能真诚互动、求同存异、抛弃偏见和误解,不能走向更高层次的战略对话,致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最终,必然损害了中日这两个东亚及世界大国的利益,给亚太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二)贸易往来呈现“经热”局面

为了恢复日本的国内经济,日本政府必须利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因此,中日贸易额在21世纪初以来呈不断扩大之势。日本已连续十年成为中国的首位贸易伙伴,而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位贸易伙伴,并于2001年成为日本的首位出口对象国,中日贸易在日本外贸总额中首次突破了10%^[5]。并且21世纪初日本对华投资也迅速增长,据日本财务省发表的统计数据,在2004年3月底截止的“日本2003财政年度内,日本企业……对中国内地的投资额达到31.43亿美元,约占它们在亚洲投资额的一半,比上年度增长了77.9%。”中日这种“经热”的贸易往来可以说维系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政冷”反过来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热”,因此,21世纪初中日也频繁发生“经贸纠纷”,日方甚至把对华经济援助与政治问题挂钩,这些也成为两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双方关系又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两国关系能否实现“双赢”,关系到21世纪东亚及世界能否真正实现稳定与繁荣。而怎样消除小泉内阁给中日关系留下的这些“负遗产”,是摆在21世纪初中日两国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2006年10月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任伊始随即访华,开始了两国关系的“破冰”之旅,2007年4月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成功访日,进行了“融冰”之旅,但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还值得特别关注。总之,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面临着诸多历史性的机会与挑战,为了实现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中国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首先,处理中日关系应分清“主次”,看到两国关系的主流是积极的,加强互信,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以及东亚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应继续执行“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外交方针。其次,通过以民间交流带动官方交往,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合作的途径,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建立起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基础。再次,中日两国政府应开展多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上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平解决争端和摩擦。

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应遵循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6]。第一,要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第二,要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就是要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绝不

再做伤害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第三,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涉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上述承诺。第四,要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积极探索解决分歧的办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第五,要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民间友好交往,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1]姚文礼. 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J].日本学刊, 2003(6): 47.
- [2]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J].日本学刊, 2003(5): 26.
- [3]徐之先,马俊威,刘军红.日本形式回顾与展望[J].现代国际关系, 2002(1): 34.
- [4]阚有林.从当前日本对华政策看中日关系[J].宝鸡社会科学, 2005(3): 39.
- [5]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 <http://www.jetro.go.jp>. (2001-12-24).
- [6]胡锦涛提五点主张望尽快扭转中日关系困难局面[N]. <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3/23135732159s.shtml>

(转引自《滨州职业学院学报》, 2007年8月第4卷第3期 编辑: 王熠)